

来！ 来！
兄弟们！ 来！ 拼！
来和他们一拼！
凭我们有这一身，
我们有双腕，
机关枪！
休怕他毒气， 机关枪！
休怕他飞机， 爆裂弹！
来， 和他们一拼！
兄弟们！
凭这一身，
凭这双腕！

赖和《南国哀歌》

台湾抗日作家作品论

栗多桂著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台湾抗日作家作品论

粟多桂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

台 湾 抗 日 作 家 作 品 论
粟 多 桂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涪陵市新妙印刷厂印刷

开本：1092×787 1/32 印张：7.5 字数：163千 插页：2
1991年 6 月第1版 1991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621-0560-X /G·380

定价：2.70元

自序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是在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並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进行坚决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台湾的抗日文学（台湾评论家称“抵抗文学”）是台湾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新文学运动而产生和发展，但它却又有自己独具的特点。这就是：在思想倾向上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反帝、反殖、爱国、亲民的光辉思想。在艺术表现上主要是遵循写实主义的民族优良传统，但又不拘一格，多姿多采，风格各异。

台湾的抗日文学，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摧残，在日寇统治的血腥日子里，台湾的抗日爱国作家，并没有被残酷的剿杀所压倒，也没有被日寇的威胁利诱所屈服。他们为维护民族与人性的尊严，祖国的独立与解放，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以笔为武器，与日寇进行了坚韧不屈的斗争，抒写出了大批不同形式的抵抗文学作品。这些优秀作品，生动形象地揭露了日寇的残酷与横暴，反映了台湾同胞的痛楚与血泪，展示了不愿做奴隶的台湾优秀儿女的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凝聚了台湾文艺家们的民族主义与对乡土故国的挚爱和对台湾同胞手足、骨肉的深情。它是血泪凝铸的一簇鲜花，是不屈历史的有力佐证。它也可以说是台湾同胞的一部血泪

史，一部为寻求自由解放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奋斗史。在异族铁蹄的践踏下，台湾抵抗文艺家们所高扬的民族反抗精神，与对日寇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憎恶和仇恨，特别值得人珍视与崇敬。而同时他们那种珍视和发扬祖国优秀的写实主义传统，那种含蓄隐晦与精巧灵活的表现手法，那种独具风格与深富魅力的多种讽刺艺术，以及浓郁醉人的乡土气息等等，无不对我们今天大陆的文艺家们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有着广泛深刻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台湾同胞的这段血与火的光辉的斗争历史，这段时期的抗日作家作品，本是祖国抗日文艺宝库中值得大书特书，特别研究的一部分艺术珍品。然而，可惜祖国的美丽宝岛——台湾，她光复至今已四十多年了，祖国大陆解放也已近四十个春秋，对于台湾抗日文学的发掘与研究，直到现在，虽有一些曾参加过这一斗争的前辈文艺家及其对此较为关注与有兴趣的少数学者、专家，作过一些回忆性的记述与片断的评论外，至今尚未发现有系统的专门研究的论著出现，有的甚至还根本不承认台湾有抗日文学的历史事实的存在。说什么台湾在日寇暴虐统治之下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同胞成天在死亡线上挣扎，毫无平等自由可言，那里还有什么抗日文学的存在？这全是对光复前的台湾文坛缺乏了解或偏见所致。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黄得时教授所指出的：“如果说光复前台湾作家为数不多是可以的。如果说完全没有作家，那是不合实情的。”因而至今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处女地和空白。这和台湾的特殊历史条件与祖国长期未能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有关，当然也和认识与了解有关。

祖国要统一，海峡两岸的人民要团聚，台湾要回归祖国

的怀抱。这是两岸人民的共同的热切愿望，也是当代历史与民心的新潮流。事实上，海峡两岸人民已在一些领域内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有意义的接触与交流。鉴于此，笔者为开拓这片处女地，为填补这个空白的万一，在笃爱台湾文学的基础上，自不量力地将自己近几年来所搜求的一些有关资料，以及所获得的一点砖石与泥块似的心得，以求在填补这一空白中献出一点微薄的力量。用粗朴的技艺，以求在垦殖这块处女地上，洒下心血与汗滴，以期造成反响，引出成山似的金石、宝玉来将这一空白填平，引出一支智勇的文艺垦殖大军，在这片荒寂的土地上，种出丰茂的庄稼来。对台湾的抗日文学，抵抗作家作品，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让台湾抗日作家在与异族作殊死斗争中的民族风骨与爱国精神得到继承与发扬。他们的智慧与心血的艺术结晶，永远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怀念和崇敬，得到全世界正义人们的赞颂与支持，成为祖国抗战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灿烂的一页。

笔者学识有限，又地处较为偏僻的巴蜀腹地——重庆。信息比较闭塞，资料奇缺，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及其具体的评述方面，不免有所偏颇。特别是对“台湾抗日文学”的认识理解，及其发生发展的分期论断与作家作品的选择取舍，均为笔者自己的个人见解，未获得更多的借鉴与参阅资料，其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希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们惠赐指正。

同时，这本小册子，只是“台湾文学”课教材的一部分。为便于学习与研究，笔者特将有关少数作家的生平与对其创作的评价，延至了抗战胜利以后，目的在于保持他的完整

性，以便给人以系统、独立的印象，但重点却在日据日
期。在论述作品方面，也极力发掘其独自的风格、特点，思
想与艺术並重，並尽量与作家的身世、经历及创作思想求得
相互吻合，以保持其历史的真实性。

笔 者

一九八七·七·重庆

目 录

自 序

- 第一章 血泪凝铸的鲜花、不屈历史的佐证
——台湾抗日文学述评………(1—28)
- 第二章 台湾抗抵作家的一面光辉旗帜
——赖 和………(29—56)
- 第三章 为最弱小人物呐喊、抗争的代言人
——杨守愚、陈虚谷、杨云萍……(57—90)
- 第四章 抵抗文学杰出的理论战士与活动家
——张深切、郭秋生………(91—114)
- 第五章 不屈的中华民族魂
——杨 遂………(115—142)
- 第六章 薄命的抵抗文学战士
——吕赫若、杨华………(143—167)
- 第七章 奋勇笔耕的中华血性男儿
——吴浊流………(168—207)
- 第八章 “隐忍”的抵抗文学勇士
——龙瑛宗、张文环………(208—232)

后 记

第一章 血泪凝铸的鲜花 不屈历史的佐证

——台湾抗日文学述评

台湾是伟大祖国的美丽宝岛。

台湾的抗日文学，是台湾新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整个中国新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台湾人民在日寇铁蹄下血和泪、仇与恨凝铸的花朵，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屈的历史佐证。它表现的是“反对帝国主义，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的主题”，是日据时期，随着民族解放斗争而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性格”的“抵抗文学”。

台湾的抗日文学，是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进行坚决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自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起，在这长长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对日本侵略者，一直进行着可歌可泣的英勇壮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武装的，也有非武装的。台湾的抗日文学就是这种斗争最为形象的反映，它是属于非武装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和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正

是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才为台湾抗日文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肥沃的土壤。

一九一九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台湾新文学重要内容之一的台湾抗日文学，它深受其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并特别突出了它旗帜鲜明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

这首先表现在：台湾抗日文学在孕育过程中，就包含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光辉思想。自甲午战争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对台湾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武装镇压，企图销毁台湾人民的反抗意志，强迫其在炮火与带血的刺刀尖下屈服；以后又兼用“柔化政策”，利用台湾一些民族败类，反动的乡绅，地主及其汉奸、走狗，维系他们那些反动残暴的殖民统治，妄图“以台治台”。这不能不激起台湾同胞进行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和反抗。如其中的一八九六年的台北巷战，武装民众一举攻入台北，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收复了台北和淡水；一九一五年余清芳等人领导的西来庵起义；一九三〇年高山族的反日大暴动；一九三九年高雄千余被日寇强征壮丁的大“哗变”；一九四四年“台北帝国大学”蔡忠恕等二百余人秘密聚议抗击与驱逐日寇……。这血与火、仇与恨的斗争，也不能不激励起有民族血性的台湾文艺家们，集中主要的力量，举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义旗，以笔为刀枪，向日寇进行曲折复杂、英勇顽强的斗争。

在祖国大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留日的台湾进步知识青年蔡惠如、林呈录等人成立了与“五四”同声相应的“声应会”，与祖国大陆采取了同步调。并于

一九二〇年一月，按照“五四”的思想和行动，组织了“启蒙会”和“新民会”。又特别仿照当时祖国大陆出版的《新青年》，创办了《台湾青年》杂志。（一九二二年改名为《台湾》）。《台湾青年》创刊号的“卷头辞”中，直接激励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后幸存的人民和经过战乱考验而觉醒的中国台湾青年，必须要“讨厌黑暗，追慕光明”，“反抗横暴，服从正义”，“挖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最后它还希望青年同胞奋起，“一齐站起来！一起前进！”这一切均标志着台湾抗日文学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开端，它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爱国的基本精神，直接运用于台湾的抗日文学和社会实践中去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台湾爱国知识分子以林献堂、蒋渭水、林幼春等人为首，组成了一个带有启蒙性质的“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任该会的总理，林幼春、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蔡培火为专务理事。虽然这个文化组织“是属于资产阶级和他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一翼”，但他“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榨取与歧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心，而增强对祖国的民族的同心力所凝结而成的”。①它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的义旗，“主张非武装抗日”积极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尽管林献堂等人，是一些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采取的又是一套和平、迂回的请愿与议会斗争的软弱办法，以此要求日本侵略者把台湾定为“特别地区”，并给台湾人民设立“具有立法权、预算、审查权的台湾议会”和“台湾自治权”等特殊“照

① 引自《台湾民族运动史》蔡培火等著

颤”，以图挣断日寇的法西斯残暴统治者的锁链。林献堂等人的幻想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因为日寇不可能把民主与自由，和平地送给台湾人民。但“台湾文化协会”对台湾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是有一定贡献的。因此，台湾人民一直认为林献堂等是“台湾迷惘年代的掌灯人”。林献堂也在一次课外讲演中说：“吾人为贯彻目的，今后遇到任何障碍亦须不挠不屈，有时虽为奴隶亦要隐忍，必须研究建设比今日更加美丽的新台湾的方法……尤须以互相扶助的精神来指导同胞。”①在日寇的铁蹄下，台湾的爱国知识分子，文艺先驱们，能够迂回，曲折地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以启发人民的觉悟，真是难能可贵，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影响下，台湾各地青年纷纷成立了具有反日性质，有着中华民族强烈意识的“青年会”、“读书会”等文化团体，孕育着台湾抗日文学的产生。一九二二年旅居北京的台湾青年学生成立了“北京台湾青年会”，聘请了蔡元培、梁启超等为名誉委员。随即广东、厦门、上海、南京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的青年组织，如“同志会”、“学联会”等等，提出了“台湾者中国人之台湾”等口号，普遍地掀起了抗日的启蒙活动。

这些铁的事实足以证明，台湾抗日文学在孕育的过程中，早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了。

这同时也表现在：台湾的抗日文学完全是随着台湾人民的武装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非武装斗争的独特形式，它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和崛起。台湾抗日文学的先驱者

① 引自《台湾民族运动史》董培火等著

赖和，在文学创作上率先树起了第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和他的新诗《觉悟的牺牲》及《前进》等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他与日寇统治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坚决与被奴役、被践踏、被残酷迫害的台湾同胞一起，为民族的生存与解除台湾人民的苦难而进行殊死的斗争。《斗闹热》一篇既揭露了日寇大搞“皇民化”运动，妄图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的可耻罪行，又暗示了台湾同胞，必须行动起来，再次进行“雪耻”的斗争。《觉悟的牺牲》与《前进》等诗篇，更是对台湾同胞对吃喝他们的血肉的“虎狼鹰犬”进行拼命反抗的民族精神，进行了高歌赞扬。

此外，杨云萍的《光临》，揭露保正谄媚日寇警部大人的丑行；《黄昏的蔗园》，控诉日寇对蔗农的残酷盘剥、压榨；陈虚谷的《无处申冤》，暴露了日寇的骄纵与横暴、台湾同胞受尽欺凌淫辱而又投诉无门的痛苦……这些萌芽状态的作品，不仅抒发了强烈的民族仇恨，揭露了日寇的种种罪行，而且对呻吟在日寇铁蹄下的台湾人民寄与了无限的同情，字里行间，蕴藏着不屈的怒火，洋溢着强烈的民族反抗精神，起到了反抗日寇法西斯统治的启蒙思想与思想鼓动的积极作用。它有力地展示了台湾的抗日文学，是在台湾同胞为挣断殖民枷锁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孕育和产生的。

二

台湾抗日文学，从它形成和产生起，就一直成为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非武装抵抗的一翼，为民族的生存，摧毁日寇野蛮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进行了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

在二十年代，它和台湾新文学一样，尚处于播种萌芽阶

段。这时的根本任务是对台湾同胞灌输民族意识，进行抗日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其广泛觉醒，以推动其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同时要尽快形成队伍，准备阵地，为抗日文学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一时期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尽管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办法，斗争也比较软弱，组织也很不纯正，但在启发民智、激励民族反抗意识方面，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之它也以各种办法，团结教育了一大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家，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展开了对日寇不同形式的斗争和反抗。

这时，作为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的赖和，他的作品是很有代表性的。无论小说和诗歌，都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感情，表现了被蹂躏的台湾同胞的悲哀与血泪，而且也表现了台湾同胞对日寇的殊死搏斗与愤怒的反抗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浩然正气。如在《一杆‘秤仔’》中，不堪日寇凌辱的青年农民秦得参，在新年的夜里，终于怒杀了日寇警察，自己也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浪漫外记》，更是一篇诱杀日寇爪牙“补大人”的绝妙作品，他给人以振奋和力量。如果说《一杆‘秤仔’》，是日寇横逆暴戾把台湾同胞逼上了拼死的绝路，那么，这篇作品则是台湾人民对敌寇的鹰犬，进行有组织的捕杀的形象反映，它真实地揭示了不堪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普遍蕴燃的复仇心理。其他象杨守愚，写于这一时期的新诗《长工歌》，陈虚谷的《无题》诗。以诗歌的形式，满怀仇恨地诉说了台湾同胞在日寇铁蹄下无言的痛苦。《长工歌》满含血泪的道出了在日寇压榨下，长工们“一年四季/不论风雨/不计寒暑/……竭尽牛马的力气”，到头来，还是“女哭寒来儿喊饿”，“头家犹是

嫌我不勤劳”的过着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无题》诗更表现了台湾同胞在强敌面前的那种“即是灭亡在倾刻，也不愿在敌人面前表示痛苦！”“我们便是死尸遍野，也不愿在敌人面前表示失意”的不低头，不流泪的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给人民以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这一时期的抵抗文艺作品，多处于萌芽状态，尽管民族意识强烈，反抗日寇暴政的思想倾向也特别明显，但艺术表现还尚未成熟。即使是赖和的作品，也可说还相当幼嫩。在思想上，他尚未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从秦得参的个人拼死反抗到《浪漫外记》的对日寇爪牙的诱杀，但毕竟是少数人的行动，不能从根本上打击日寇的气焰与摧毁他们的残暴统治。当然处于那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对赖和作过高过分的要求，然而指出其不足确是必要的。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也还比较粗糙，根本谈不上人物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侵略者及其鹰犬爪牙们，其性格多是凶恶、横逆与暴戾，显得较为简单。而反抗者的形象，更为薄弱。在表现手法上，政治议论过多，形象的具体描写微弱，不能不影响它们的艺术感染力。至于其他作家的作品，也与赖和有类似的情况。这是播种、萌芽期的抗日文学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

从三十年代初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整整七、八年间，台湾抗日文学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局面。其原因是：一方面，日寇对台湾同胞进一步加强了压制，以配合他蓄谋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战略要求，引起了台湾的爱国文艺家与台湾同胞从正面、侧面、公开和隐蔽的拼死反抗。因为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一

九三三年日寇非法逮捕台湾共产党员四十五人，使台湾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在朱点人的《岛都》，康道乐的《失业》等作品中，都有较强烈、隐晦的反映。另一方面，是三十年代祖国大陆左翼文学运动对台湾新文学的直接影响，它进一步发扬了抗日反帝精神，抒发了民族的正义。

这一时期，不仅扩大了抗日文学的主要阵地，而且还出现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比前一时期显得成熟一些了，它不再是通过人物故事较为简单地去揭露日寇的罪行，及特定的社会现实，而是着重去描写那个现实的令人窒息的可怖气氛，开始注意了人物性格的描写，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

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的基本阵地是《台湾民报》（一九三一年改为《台湾新民报》），作家也较有限，可是到了三十年代，发展就很为迅猛了。“台湾新民报”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从周刊改成了日刊，并扩大了文艺栏目，极力鼓励新进作家的创作。一九三一年秋，以赖和为代表的一些台北的文艺家们，共同组成了“南音社”，并于一九三二年创刊文艺杂志《南音》半月刊，以重金公开征募小说、诗歌、戏曲、春联等，这给当时台湾的抗日文学震动很大。《南音》专门性文艺刊物的问世，是抗日文学继续喷射反帝、反封建烈火，出现了新的文学阵地的重要标志。

一九三二年三月，巫永福，王白渊、张文环等人，为唤起民族意识，“以文化形体，使民众理解民族革命”，以“图台湾文学及艺术的向上为目的”，在东京成立了“台湾艺术研究会”，这是台湾抗日文学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文艺社团。发行文艺刊物《福尔摩沙》。创刊宣言直接宣传有光輝

传统的祖国文化思想，指责“台湾自编人与日本人的殖民地以来，在这特殊的国情和经济上被压榨的政策之下，我们确实喘不过气”来，并说：“现在的台湾，不过是表面上的美观，其实十室九空，可比是埋藏着朽骨烂肉的‘白冢’。所以我们必须从文艺来创造真正的‘华丽之岛’。”主张“联合同志，一起奋斗，交换意见，发展文艺”。但因会址、刊物均设在日本东京，远离台湾，对台湾影响不很大。然而它毕竟是一个专门性的艺术研究会，对抗日文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福尔摩沙》杂志出了三期以后，便与《台湾文艺》合刊发行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湾本土台北市，由郭秋生、廖汉臣为首发起组织了“台湾文艺协会”。是在台湾本土内成立的又一个文艺团体，郭秋生被推为干事长。其目的是以“自由主义为会的存在精神”，谋求台湾抗日文学的健全发展。他们创办了中文文艺刊物《先发部队》，于一九三四年发行。主要刊登会员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他们在创刊“宣言”中说：“我们已经出发了。当不能因障碍多而解消内心的燃烧与信念。我们敢不以《先发部队》的精神和使命自许，向目的地勇敢突进……使全面的台湾新文学能够健全的发达与繁荣，进而应付时代的要求，做起未来的所有生活分野的先驱和动力吗？”郭秋生还为《先发部队》的创刊号写了“序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

烽火发了，
为跃进而跃进的烽火，
出发了，先发部队！